

读史阅世

# 公共园林在地方城市的崛起

## ——唐碑《球场山亭记》史料价值寻微

□沈伟棠 文/图



史海钩沉

### 泉州元宵踩街史话

□杨祖荣 黄子祯

每逢元宵佳节,古城泉州都热闹非凡。宋代古戏唱词曾这样描写节庆盛况:“元宵景色家家乐,箫鼓喧天处处香。上下楼台火照火,往来车马人看人。”

《泉州府志》载:“上元夜张灯,以米圆糍先及神,或以酒饌祀祠堂谓之祭春,又上元内外赛会迎神,乡村之间或于二月谓之进香。”泉州尚为南音,每至元宵,必弦歌不绝。而南音曲中又以“陈三五娘”故事最受欢迎,《泉州弦管曲词总汇》统计,2050首南音曲词中,取材自“陈三五娘”者竟达210首之多。

《陈三五娘》讲述陈三与黄五娘于元宵相知相识,恋爱私奔,最终结成美好姻缘的故事。正如其中《幸逢太平》一节所唱的,“只正是春宵一刻,果然值有千金。灯月交辉,歌楼台。见许千门万户,图画共彩绣,排列东西。咱今对只光景,恰似桃源境界,紫薇天台。娟娟随娘到此蓬莱,游赏好元宵,真个是令人可爱。障般好光景,今卜再等新年来。障般好光景过了,今卜再等新年来。”于是,元宵在泉州既成了青年男女的“情人节”,也成了全体市民欢度新年的“狂欢节”。

“过十五,看踩街”,泉州的街头巷尾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连同离泉的他乡游子也时常把它牵挂于心。可以说,泉州的元宵节与踩街民俗密不可分。

踩街又称“装人”。清末陈德商《温陵岁时记》载:“上元前夜后夜,好事者或摘某诗句某传奇,饰稚小儿童,装扮故事,导以火把鼓吹。爆竹盈耳,游行市上,谓之装人。即古雉意也。”这种风俗最早可以溯至隋唐,此后历宋元明清四朝盛行至今。

游神像、演故迎新,连同钟鼓爆竹、杂技歌舞,踩街时的种种热闹景象最初是古人驱疫除秽、娱神祈福,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礼俗。随着时代发展,其中民众娱乐自身的成分逐渐增加。明万历《泉州府志》云:“元夕张灯,端午竞渡,中秋玩月。唯时和年丰,家给人足,聊以自相欢娱,而装饰神像,穷极珍贝,阅游衢路,因起争端,犹钱置酒,互相鼓动,日昏酣而不知止。”一幅纵兴极欢、不加拘束的民间节庆景象跃然纸上。《闽书》中也记录了相似的画面,何乔远写道:“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妆扮故事,盛饰珠宝,钟鼓震天,一国若狂。”这种激情四射的狂欢气氛,无疑是踩街亲历者的共同感受。

迎神赛会是泉州节日的一大特色。陈德仁《泉南杂志》载:“迎神赛会,莫胜于泉。游观子弟,每遇神圣诞奇,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索以绮绘,周翼扶栏,置几于口,加幔于上。而以娇童装扮故事,衣以飞绦,设以古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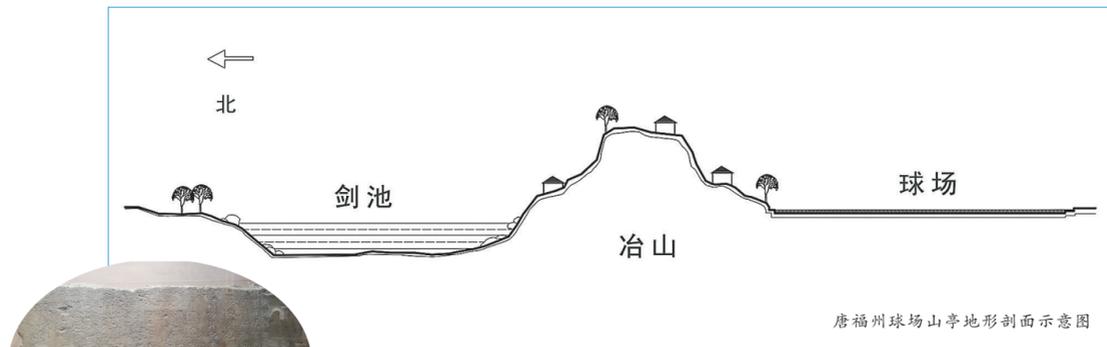
历来迎神,又以元宵踩街时最为壮观。泉人称元宵为“上元小年兜”,每到这天,泉州都要举行盛大的众神游行,亦称“巡城”,从晨至夜,盛况空前。《泉州习俗》一书记载,当天所迎神明皆为四抬以上,其中通淮关大帝、花轿真人、南山天妃、虎山王相公、古榕树境玄坛元帅等神格较高者,甚至加至八抬相迎。神前有道士,道士之前有鼓吹,鼓吹之前又有虎冠假面的巡遊。此外,迎神队伍中有材官、骑士、执旗、校尉、奴、君校、巷头、旗手等百余人以及抬阁、软棚、妆神随驾而行。是时,境内人家无不焚纸恭拜,可谓至极感荣。

两岸一带水,随着人口迁移,神明便同元宵节庆一道漂洋过海。清高拱乾《台湾府志》记载:“元夕,初十放灯,逾十五夜乃止,门外各悬花枝。别有闲身行乐者,制灯如飞状,歌曲者数辈为伍,一人持之前导,吹笙,以丝竹以次杂奏;谓之‘闹伞’。更有装束昭君、婆姐、龙马之属,向人家有吉祥事作歌庆之歌,悉里语俚词,非故乐曲;主人多厚为赏。神祠,俱僧道设醮祈安;醮毕,迎神……”又称迎神为摆蹙,所迎群神中以天妃(即妈祖)最受尊崇,马祖南竿岛上妈祖巨像抬头可见。每至元宵之夜,各地信众都会恭请“大妈”绕境巡游。

除了迎神,生性达观的泉州人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来喜庆元宵。明代崇祯年间陈德法所作的《崇武所城志》写道:“望日为上元节,各家内外张灯,老少作乐,或庆大有之年,则官民同乐。大结鳌山,星桥火树桥,达呼四境。题诗联者半雅半俗,呼夜醉者东倒西颠。随意,穿仗俩,以取欢通,通宵达旦而后止。”这一天,能歌善舞的民众组织成队,沿街表演。打头的往往是舞狮表演,泉州的舞狮自明代起就已声名远播,经历代民间艺人整理提高的舞狮艺术已形成了典型的南派风格,粗犷豪放与细腻细腻配合无间。

紧随其后的是神态毕肖的香火草龙与饶有趣味的火鼎公婆,并在击腰鼓、巨鼓者奋力敲打喧天锣鼓声中,享受着街边男女老少的喝彩欢呼。也不能不提及独具特色的惠安女织网舞和号称“国之瑰宝”的泉州古戏,这些“活的文物”是这座文化名城厚重历史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唐福州球场山亭地形剖面示意图



唐《球场山亭记》残碑(福建博物院藏)

在7世纪之前,中国园林已形成了皇家、私人与寺观园林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唐以后,一种新的园林类型——公共园林开始在地方城市兴起,世人熟知的杭州西湖便成名于这一时期。遗憾的是,受史料限制,学界对这一新园林类型的兴起缺乏深入探讨,而福州出土的唐碑《球场山亭记》为此开启了一扇小门,让我们得以窥探园林史的这一新变。

唐碑《球场山亭记》于1958年出土,为闽中金石年代之最。出土时该碑残损严重,学者陈叔同据梁克家《三山志》的记录复原了这块唐碑的基本面貌:其正面篆刻唐元和八年(813年)山亭营建之过程与二十九景之名,背面则刻有主事者福州刺史裴次元所作亭序与20首咏景诗。

“球场”中“球”系从西域传来唐代甚为流行的马球。“山亭”系唐人对以山为主体骨架的郊野园林的指称,其中的“山”唐时为冶山,系今之冶山。“球场”在“山亭”之南,两者比邻而建。球场山亭建成之后,裴次元还郑重其事为其立碑,可见在他的心里,这是一项足以传告世人的重要工程。唐时的球场山亭,大致位于今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以东的冶山周边区域。

需要明确的是,球场山亭是福州城的公共园林,并非私人享乐之所。细察碑文背面落款:福州刺史裴次元、监军使宣议郎刘元弼、观察判官杨郁伯、观察推官冯审,其中冯审作为校书郎还是碑文的撰写者。主持营建的4名人员均具公职身份,足见营建山亭是一种公务行为。

此山亭亦非宋代以后专属于官府人员的衙署园林,它紧邻着供市民游赏的公共空间——球场,并能与之相通。碑文曰:“清风长在,双舟泛浮,与仁智游。”后任刺史杨发为寻找裴次元的题壁诗文而“访于邑宰(客),得其本”。这里的“仁智”与“邑宰(客)”并非特指官僚阶层,说明该山亭彼时对市民开放,他们可享用这座山亭。通读碑文,我们亦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共有共享的政治理念。

这座山亭因何而起?在山亭修建之前,冶山横卧于新建球场与剑池古迹之间,阻碍了往来交通。碑文记载,为解决此困扰,裴次元多次进行考察,发现冶山“维石岩岩,峰峦峻峭耸其左,林壑幽邃在其右。是用启迪高深,必尽其趣;建创亭宇,咸适其宜”,且与“北乃接山麓,翳荟荒榛”的球场相接,是天然的造园佳处。于是他在冶山上开山造景,“转石而峰峦出,浚壑而池塘见,高亭结构而虚敞,为潭、为洞、为岛、为沼,窈窕深透,安可殚极”。

既营建出巧夺天工的山亭胜景,又贯通了山之南北,化解了交通之困。山亭的营建将球场、剑池古迹以及周围的山水胜景联结为一体,形成一个自然与人文相交融的风景游憩区。裴次元的设计意匠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因山营园,其间路桥连缵,亭台起伏。天泉池、桃李坞、芳茗原、越壑桥、筋竹岩、山阴

亭、白土谷、秋芦岗、磐石椒、涵清洞、红蕉坪、独秀峰、涟漪亭、东阳坡、枇杷川、石堤桥、八角亭、筑笋坳、分路桥、观海亭、梅榴亭、双松岭、登山路、乾冈岑、松筠陌、望京山、夜合亭、玩琴台、木瓜亭,二十九景遍布于冶山上下,山水宜人,一花一树皆成一景。亭、岭、路、池、台、岩、川、岗、坞、原等元素或高或低而错落有致,或幽或明而彼此映照,丰富着游人的空间体验与感受。人居山阴亭,便能因借相对高耸的冶山地形俯瞰山南球场上的马球比赛。

这座山亭在彼时的福州,却深受长安园林文化的影响。其因郊野之地而成景,为一景取一名,每景又赋诗一首。这种造景赋诗方式在唐长安地区的诸多都城园林中已十分常见,王维的《辋川别业》便是其中的典型。此外,在马球场的四周建亭配景而游赏成风在长安城也已司空见惯。长安城是大唐帝国,乃至全世界文明的高地,而彼时的福州还是一座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南方小城,它竟有如此新潮之物,应归功于主事者裴次元。

进士出身的裴次元入闽前曾是太府卿(从三品),不仅总掌管着财政、贸易,也统管着京都四市、常平七署。他深受长安文化的熏染,熟谙园林营造法式,当他在福州城面临球场山亭的选址、造景等问题时,自然会将他在此间习得的经验移植到福州的城市建设中。

除北园南渐的浸润之外,福州作为海洋商贸城市的崛起则为这座公共园林的兴建奠定了坚实基础。福州自古背山面海,海运优势得天独厚,唐代以后海上贸易尤为活跃。“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代诗人包何在我们描绘大批外国人在福州进行朝贡和贸易的繁华景象。据碑文记载,大量外商番客的到

来也产生了“风俗时不恒”等社会问题,但裴次元励精图治,“政既实设,而邦人和”。而“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藩镇割据、战乱频发,致使大量人口南迁,涌入政治相对安宁的福州城,带来诸多先进的生产经验与技术。加之历任主政者的苦心经营,到9世纪初叶,彼时福州已政通人和、经济丰饶,市民安居乐业,休闲娱乐之需日盛,兴建球场山亭已成为主政者裴次元的当务之急。

城市之需让裴次元获得了兴建这座山亭的理由,但更为深刻的则是士大夫园林观念的转变。“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唐代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否定了园林观游乃“非政”的观点,转而认为其乃为官之助,系善政之果。碑文有言:“公之廉察观风,为天下最之如此也。”……旨,传命,月无虚,时无缺,懿乎。”其背后的逻辑与柳宗元的新论如出一辙。

对裴次元而言,兴建球场山亭不止于碑文所言的“以悦或旅而宣武事”与“只壮郡府”,建造一个世俗化的社会教化场所,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理想境界,亦能向外彰显卓越的治理政绩,从而树立勤政有为、与民同乐的自我形象。于裴次元这类朝廷外派的官员而言,公共园林建设一方面可从案牍劳形中解脱,放松心情,另一方面可展示才华与绩效而博得百姓口碑。遍观白居易在杭州、柳宗元在永州与柳州、颜真卿在湖州所主导的园林营造新气象,其动因亦不出其外。

唐以前,园林作为皇族权势或家族实力的表征,只是少数人的专属之物。但球场山亭的兴起则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园林文化的深度转向,即在贵族和精英文化主导的园林文化潮流中衍生出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趋势,并由此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诞生了真正供城市居民享用的公共园林类型,这构成了中国园林“唐宋转型”的重要面向。

其包含着两个重要面向:一方面诸如中唐裴次元在“报政之暇”兴建球场山亭,被视为政成俗阜的产物,不再被贴上“大兴土木”的负面标签。及至宋代,士大夫更是将修建

公共园林作为职责达成后的展示。北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之后重修岳阳楼,其好友范仲淹在为其所作《岳阳楼记》中高度赞扬范仲淹行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另一方面,“与民同乐”的儒家思想在公共园林之中得以重新诠释。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儒家向来主张“劳则生,逸则亡”,这才有造园冲动的士大夫背负负物丧志的道德包袱,也会在无形之中强化他们对山水之乐的追求。但在中唐之后,儒家这一旧的思想羁绊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柳宗元所提倡的新的园林游乐观念。同时,商贸娱乐城市的兴起与城市居民群体的壮大,也使得民众的休闲娱乐之需,已成为主政者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碑文记载,裴次元“心逸、思畅,自然逍遥”,并非独乐,而是“与仁智者游”,城市居民得以进入园林观游娱乐。北宋福州太守程师孟新建福州城另一公共风景区——道山亭,其所秉持的初心与之一脉相承。

宋元时期,福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大步迈入市民城市时代。《三山志》记载,程师孟对剑池(宋称“欧池”)进行了改造提升,“于是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舫,可燕可游”,并继续对市民开放。彼时福州城市风景园林体系建设已较为完善,公共游赏活动愈发增多,如二月州府开放花园的游玩欣赏,清明时节的东郊游山踏青,端午时节的西湖划舟竞渡,重阳节的九仙山登高赏菊……而这一切皆可追溯到中唐时期这一座球场山亭的兴建。

此球场山亭的营建不只出于勾连冶山南北交通之需,亦是官员美政思想的物化与福州城市文明发展的产物,亦可称之为城市公共园林崛起的典型。从中唐始,至宋代,中国园林最终形成皇家、私人、寺观、公共园林四分天下的新格局,而球场山亭则正好处于这一演化脉络的起点上。如今的冶山春秋园,建于唐代球场山亭旧址之上,仍然是福州城区居民的休闲娱乐场所,滋养着福州作为山水型城市的文化性格。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

乡土史记

# 崇武古城:城筑如荷花穴

□张建 李聪 文/图

“孤城三面鱼龙窟,大岞双峰虎豹关。”崇武古城位于今泉州市惠安县崇武半岛中端的崇武镇区,其形成与明代海防有关。古城蕴含着丰富的营建智慧,其特色之一体现在利用与保护山水自然环境方面。

古城的位置具有湾口要地、海陆端点的特征。从泉州湾来看,崇武半岛位于其北翼,呈东西向狭长状深入大海,是从东南方向登陆进入惠安县城的必经之地,“上与莆之南日、涠洲,下与晋之永宁、祥芝相为犄角;而邑北之沙格、峰尾,东北之黄崎、小岞,南之獭窟、泉涂皆缩居内地,藉崇武为其捍蔽而为之声援,内外相犄,基置周密”(清嘉庆《惠安县志》)。

崇武半岛地势较开阔,地形以台地、山丘为主。古城位于莲花山附近,基本位于古雷山、三峰山、赤山、大岞山、青屿、龟屿等山体、岛屿构成的环状群山的中间位置,从而能够给官兵带来心理安全感。位于莲花山与大岞山之间的区域在明代还是沙地,其两边的沙岸具有一定规模,因而十分适合登岸。大岞山设有捍寨,却因孤悬东端只能以海上防御作为重点。以莲花山为基础设城,既能与大岞山的捍寨一起阻击敌船登陆,又能阻挡敌人向西进入内陆地区。总的来看,崇武古城同时满足了区域防御、陆海防御、心理防御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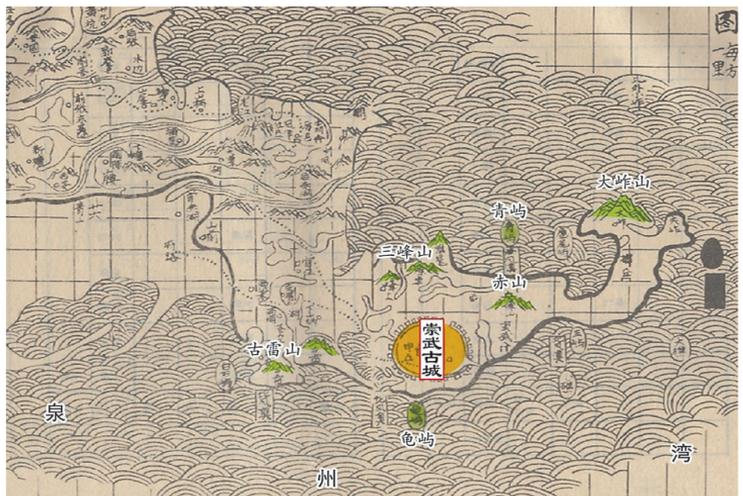
古城的基址具有适形踞高的特点。莲花山及其周围山丘是一片地势相对较高、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区域,建于其上的崇武古城能够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尤其是临海的一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墙防御能力。一些较高的山丘甚至被直接作为古城东南城角、西南城角、北城门与西城门位置的所在

地,从而使“城筑如荷花穴,山顶头(莲花山)如蒂然”。另一方面,崇武半岛“斥卤广漠,飞沙所掩”,选择莲花山及其周围山丘作为古城基址,还能减少恶劣的环境条件给居住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古城的街道呈现出随形就势的特点。东南城角、西南城角的地势最高,之间地势最低的位置是南城门,其与北城门之间通过由南城门、中亭街、北门街组成的南北向街道进行联系。与南门的位置相类似,东城门位于东南城角与北城门之间的较低位置,以此作为端点

的东门街与南北向街道垂直相交。西门街以西门为端点,也与南北向街道垂直相交。

这种适应自然地形的“双T”字形街道系统有两大好处:一是很好地解决了城内排水问题。建于高丘之上的崇武古城拥有不错的防御能力,也因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条件需要考虑如何排水。为此,先利用重力将雨水汇集到与地形相适应的“双T”字形街道,再通过水涵、水关排出城外。二是满足了崇武所城的高等级对于街道平面形制的要求。负责崇武所城的千户位列正五品官位,高于惠安县令,



崇武古城与山体、泉州湾的位置关系

双“T”字形街道不仅结构清晰、相对规整,还为公署这一重要设施提供了中心位置。

古城的中军台和朝阳楼呈现出置屋顶的特点。中军台是除公署之外的重要军事设施,由戚继光修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位置是莲花山顶部,可以“瞭望东南北海上来舟,及伏路墩墩去处。有警时,掌印官在台中指授,通城军民人等尽照派定垛口各执器械防守”。与中军台、公署的军事功能不同,朝阳楼是“启文明”的重要设施,由当地进士戴卓峰于明万历年间倡建,建于城东南角的高处,可谓是“极海之巨观,东陲之胜胜也”。

与一般的白面妈祖(俗称“大妈”)、粉脸妈祖(俗称“二妈”)不同,崇武天妃宫奉祀的是较为少见的黑脸妈祖(俗称“三妈”)。天妃宫位于古城西南的江口山麓,通往渡口的必经之地,最近建于明永乐年间。水潮庵因“潮水直到庵前”而得名,其位于城内西南方,相传早于建城之时,奉祀释迦世尊诸佛。综合来看,天妃宫和水潮庵都是因海而生的民间官庙,位置皆与水毗邻,由此形成自然与人文相融的地域文化景观。

在崇武古城,山水自然环境不仅是利用对象,还是保护对象。因大风引起的沙患是崇武半岛的主要自然灾害,会直接对城池的防御能力带来不利影响。于是,古人制定禁止垦殖的规约以保护城墙周围的土地环境。据《惠安仁侯靖王陈公禁垦护城碑》记载:“国初,留近城地禁民耕垦,使其莎莽蔓生,缀带盘根,则土膏用坚,风尘不动。”除了城墙周围,崇武古城的其他地方也受到关注,据有关碑志记载:“后湖埔一带荒地,不许划土扬沙,壅塞城垣,致妨守御。”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